

闽南方言与闽台文化

李如龙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思维长期发展的成果。它不但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每一个变化和发展的忠实记录，也是社会文化活动赖以进行的凭借。语言不但是文化的形式，它的发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方言是全民语言的地域变体。社会的分裂、人民的迁徙、地理的阻隔和民族的融合造成了方言的分化，方言的形成是文化发展中的历史现象。方言之间的差异直接反映着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所形成的文化差异。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经济生活、不同的习俗和观念无一不在方言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不同的方言之间所反映的地域文化特征不但有许许多多这类具体概念——语词上的差异，而且有共时的整体的类型特征和历时的多层面的发展特点。

闽南方言是汉语闽方言中分布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一支。它形成于闽南地区，播散于东南沿海的五个省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在闽南方言所分布的广袤地域之中，闽南和台湾的闽南话不论在内部结构上或是外部的文化特征上都最为接近。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本文是就这个问题所作的研究报告，限于篇幅，先写成一个论纲，希望引起同道的关注和方家的指教。

一、闽台两省的闽南方言

（一）闽南方言的形成

闽南方言是东晋到初唐之间在福建东南部形成的。汉人大批入闽，最早应是东汉末年孙吴经营江东之时，主要途径是自闽北到闽东而后到闽南。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原管辖着全闽的建安郡分出了闽东闽南的晋安郡，闽南则建有东安、同安两个县。东晋之后，入闽的汉人更有批量的增加。如《晋书·地理志》（卷318）所云：“闽越遐阻，避在一隅，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最早到达闽南的中原汉人用自己所思念的故国为晋江命名，这种说法应是有历史根据的。南朝的二百年间，福建较之江左江右相对平静，又有不少汉人自闽北经闽东来到闽南。到五世纪初的梁天监中，今闽南地区（晋安郡南境）又分置南安郡。唐初总章二年（669年）闽西、闽南畬民起义，朝廷派中州人陈政统府兵五千多前来平定，不少河南人跟从而来并在闽南落户，这

是又一次中原汉人垦发闽商的重要史实。据《元和郡县图志》的统计数字，距总章年间不到百年的开元年间，闽南的泉漳二州所辖的七个县（南安、晋江、莆田、仙游和龙溪、漳浦、龙岩）已有5万多户，占全闽5州23县总户数的一半以上。到这个时候，闽南方言应是定型了的。（当时的莆仙方言还没有从闽南方言中分出来）现今的闽南方言语音还有许多与隋唐的韵书《切韵》、《唐韵》相符，足可证明这一点。从初唐形成到现在，闽南方言已有近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二）闽南方言的流播

中唐之后，土地兼并，赋税繁重，政风腐化，在闽南地区，加上人多地少，发展局限，闽南人口或逃亡迁徙或被贩卖为奴，户口数迅速减少。据《元和郡县图志》和《通典》记载，自开元到建中中间不及百年，泉州的户口从50754户锐减为24586户。外流的人口哪里去了？看来是向南迁徙了。在上述统计户数中，漳州户数不但未减，反而从1690户增加至2633户。有的可能进一步到了潮汕平原。据《新唐书·地理志》唐代潮州和循州七个县全是中下小县，总共只有13945户，到了宋代，据《宋史·地理志》，循州分出惠州，湖州分出梅州，共有11个县，其中“紧”县1，“望”县3，“中”县2，共有195365户，总户数较唐代增加了近15倍。应该说，潮汕地区和海陆丰一带的闽南话就是中晚唐之后从闽南陆续传去的。至今潮汕平原乃至后来再从那里迁往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诸多族姓还自称祖上来自“莆田荔枝村”，这种民间的口碑应该不会是讹传。因为到宋以后莆田方言就逐渐和闽南话分手了；莆田也确是人口密集的六千户以上的“上县”；那里所出产的荔枝也早在唐代就负有盛名。

宋元之后，泉州港兴起，造船、航海和对外贸易兴盛一时，闽南人不但进一步在粤、琼两省的沿海定居而且广布于东南亚各国。有关海外交通的诸多典籍不乏直接的记载。至今仍通行于那些地方的闽南方言以及马来语所借用的大量闽南话语词则是现实的明证。

明清之后，泉州港衰歇，倭寇骚扰，人多地少的闽南，益加经济凋零，除了继续南渡菲律宾、新马、印尼、泰、越等国谋生之外，有的由海路北上或捕鱼或从事手工业，移居闽东（霞浦、福鼎）沿海和浙南（江山、平阳、苍南）沿海。有的因清初沿海“迁界”而被迫移居内地，远者达浙江、江西，这些小批量的迁徙留下了现今的闽东、浙南、江西等地的闽南方言岛，而大批量的国内迁徙则是跟随郑成功父子收复台湾和垦发台湾。

郑成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发起驱除荷兰殖民者的战争，为反抗清廷的“迁界”、封锁，又大力组织军队的屯垦并发展海上贸易。先后渡台依附他的泉漳二州百姓达数万人。康熙年间，清廷据有台湾，本拟虚其地，经晋江人施琅之谏而止，虽仍禁止军政人员携眷入台，但入台闽人已近30万。至乾隆间，禁令渐除，之后，入台人数迅速增加。据《台湾府志》，乾隆间全台有15000多户，72万人；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全台已有24万户，200万人。应该说，以泉州腔为主，掺杂穿插着漳州腔的台湾闽南话在三百年前就大体定型了。

(三) 闽台两省闽南方言的分布

就现实的情况说,福建境内的闽南方言主要分布在泉州市所辖的鲤城区、晋江市、石狮市和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等六县三市,厦门市及所辖的同安县,漳州市区及所辖的龙海、华安、长泰、南靖、平和、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十县市,(平和、南靖、诏安三县西缘有客方言)龙岩地区的龙岩、漳平二市,三明市的大田县西南部。除了这一连片的“本土”之外,省内还有13个县有闽南方言岛,人口较多的有福鼎县沿海12乡的97村,近二十万人;霞浦县沿海33村,四万多人;福清市南部、顺昌县中部、沙县中部各数万人。全省说闽南话总人口约1500万。福建境内的闽南话大体分为四种口音,北片泉州市属地区和多数省内方言岛是泉州腔,南片漳州市辖区是漳州腔、厦门、金门是杂有泉、漳两种口音的厦门腔,西片漳平、龙岩属于龙岩腔。

闽南方言是台湾省内的主要方言,除中部山地高山族居住区通行高山语和苗栗、新竹两县多数客家人说的客家话外,岛缘四周的沿海平原和丘陵地区大都通行闽南话,自北至南的丘陵地带还分布着许多客家方言岛。事实上许多客家人和高山族同胞也兼通闽南方言。使用闽南话的人口占全省人口的80%,大约也是1500万人。台湾省内的闽南话也有泉州腔、漳州腔之别,大体上北部和南部多泉州腔,中部多漳州腔,在许多地区两种口音相互穿插也相互影响,多数人所说的闽南话也像厦门话那样综合着泉、漳两种口音并以泉州腔占优势。

(四) 海峡两岸的闽南话最为接近

就国内的分布说,闽南方言可分为五大块,即本土闽南话、台湾闽南话、潮汕闽南话、琼雷(海南省和广东省的雷州半岛)闽南话和浙南闽南话。在这五大块之中,闽南本土和台湾省这两大块的闽南话是最为接近的。单就语音方面的差异举些例子说明。

琼雷闽南话以文昌音为例,声母方面紧喉音ʔb、ʔd,分n-l,ts‘读s(炒菜说“洒赛”),ts、s读t(驶船说“歹唇”),k读h(开空说“辉夯”);还有大量的“训读”现象(如思读想,贫读穷,看读望,捆读缚等等)。这些都是其他闽南话所未有或少见的。潮汕闽南话以潮州话为例,声母m、n、ŋ和b、ɿ、g有别;韵母中没有-n、-t尾韵(班=帮,八=北),有I韵(资此思),ɔ读on(粗布,乌裤),ue读oi(洗鞋,买卖);单字声调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八调齐全以及连读变调中有双音词后音节读变调的条例等等,也是颇具特色的。浙南闽南话也有I韵,没有-m韵尾(林=鳞,心=新),塞音韵尾只有-ʔ,没有-p, -t, -k,变调规律也有许多特殊性。

而台湾闽南话的语音系统和本土闽南话几乎没有差别,声母都是15个,声调七种和厦门极为相近,不论是泉州腔或是漳州腔,所有的韵母都没有超过本土闽南话的范围。无怪乎两个素不识面的台湾人和闽南人在一起可以畅通无阻地交谈。

为什么在五大块闽南方言中竟会是隔着海峡,先后断绝过八十年往来的闽台两地最为相近,其余连片于大陆的反而变异更大?不妨先看看其余三大块变异较大的原因。潮汕闽南话在各大块中从闽南分出最早(中晚唐至两宋),之后又一直为岭南道所辖,论

自然条件也比闽南好，因而得到独立的发展。琼雷二州是宋之后陆续从潮汕、海陆丰迁徙而去的，那里本有黎族瑶族诸语言和粤方言，历史虽较潮汕地区的闽南话短，却难免受到较大影响，因而发生较大变异。至于闽东和浙南的一块，虽有清初才陆续北移，但因地盘狭小，人口也不多，迁出之后与本土来往稀少，深受闽东方言和浙南吴语的影响是必然的。

传到台湾的闽南方言，从时间说，只有三百余年，原有的土著高山族人数不多，所操语言属南岛语系，和汉语相去甚远，且文明程度悬殊，自不容易对闽南话施加影响。更重要的是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二百多年间概属福建管辖，官方及民间的往来一直是十分频繁的，即使在清廷残酷迁界期间或是建省之后亦从未间断过。1895年之后，日本侵略者占据台湾五十年，虽然穷凶极恶地实行殖民统治，千方百计摧毁我民族意识，推行奴化教育，以至禁止使用汉语汉文，其结果只能引起台湾人民更为强烈的反抗。仅开头的二十年间，台湾人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就有一百多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闽南方言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保留得更加完整、更加地道（台湾通行的客家话也一直少有变化，至今与梅县口音毫无二致）。

二、闽南方言的文化类型特征

方言是在一定地域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方言和地域文化的关系可作共时的考察，也可作历时的分析。共时的考察可以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微观的考察主要是透过某些方言词语去追寻命名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史实，例如某些名称（番薯、番姜）说明了经济史上引进外地作物的事实；某些人地名的应用（国姓爷、成功路，晋江、漳州、泉州里、南安村）寄托了人们对故人故土故国的特殊感情；避讳反映了禁忌的习俗；亲属称谓则反映了历史上的家庭婚姻制度。宏观的共时考察可以从诸多方言的比较去探索方言的文化类型。本节就是这种宏观的共时考察。用所概括的五种文化类型特征，来进一步说明闽南本土和台湾省内的闽南方言的文化类型特征是最为接近的。

（一）向心型。

每一个方言区都是由一群小方言组成的。有的方言区中的小方言差异大，各自为“正”，漫无中心，连方言区和小方言都没有明确稳定的名称。闽方言中的五个方言区，只有闽南话和莆仙话是民间通行的习惯名称，早期闽南话分化出来的这两个区的内部差异都相对较小，尤其是漳泉厦地区和台湾省的闽南话。差异之所以小，是因为有方言代表点作为中心，对各地小方言发生影响。闽南话早期代表方言是泉州话，早年形成的闽南方言艺术都以泉州音为标准音。泉州兴起于唐代，极盛于宋元，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后来漳州月港兴起，大有代替泉州港之势，漳州府人口骤增，形成了自己的中心，这就是和泉州音相去不远但特色显然的漳州腔。郑成功建设厦门军事基地之后，厦门日渐聚集了泉漳二府的人，遂改“中左所”为思明州，清末五口通商

之后又得到急剧的发展，成为闽南地区出入境的大港，泉州腔和漳州腔在这里融合为新的厦门腔。近百年来厦门话已经上升为闽南方言的新的中心，新的代表。台湾的泉州腔和漳州腔实际上也在不断地交混，向厦门话靠拢。

作为闽南方言的“中心”的标志，闽南地区早有编纂方言韵书的传统。早期的泉州标准音有黄谦所编的《汇音妙悟》，初刻于嘉庆五年（1800年），距今已近二百年。后来的漳州音和厦门音又有《十五音》和《八音定诀》。这些闽南话韵书在民间一直流传到本世纪上半叶，实际上发挥着为闽南方言维持标准音规范的作用。闽南方言韵书之多是其他汉语方言所少见的，这也有力地说明了闽南方言是一种向心形的方言。

闽台闽南话所以成为向心型方言，是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决定的。除了沿海及内河冲积平原之外，这里都是低山丘陵，唐以来人口稠密，交通便易，又由于城市海港的兴起，商品经济相当发达。闽南洋，营外贸，开发台湾，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峡两岸闽南人社会生活中的共同事业。因为交往日多，新的方言差异就难以发展，而有着先进的城市和海港，则容易形成中心。

（二）稳固型

从古今的流变说，闽台闽南话属于稳固型，即变化较慢，生命力强。就近的说，200年前的《汇音妙悟》，《十五音》与今天的泉州漳州的口语语音并无显著不同；400年前闽南话戏曲《荔枝记》等）的刻本现代人还完全可以读懂。拿远的说，闽台闽南话文读音在许多方面和唐宋以来的官音（广韵系统）至今还十分相近，例如“轻唇读重唇”：飞、分、放、麸、纺、富、腹、缚、肥、缝，口语都读b或p；“舌上读舌头”：中、追、猪、抽、拆、畅、茶、绸、虫、锤，口语都读d或t；三套鼻音韵尾与塞音韵尾俱全：甘心-m、合集-p、安身-n、扎实-t、农耕-ng、目的-k。词汇语法上也有许多和中古诗文完全一致的说法。例如“画眉深浅入时无”，“有诗无”，“今在无”；“寒梅着花未”，“小蛮问我诗成未”、“花开未”；这类词句就同今日闽南话无异。

这种变化缓慢的稳固性和历史上的相对稳定有关，闽南地区垦发之后，偏安一角，未曾有太大动乱。又与地处海隅，人口密集有关。本地人尚且要奔走海洋，外地人口更是难以移居进住。在语言内部特点上，闽南方言形成了文白异读的两套系统，也是促成它的稳固性的因素。文读便于读书作文，与外地人交往；白读则便于本地人的日常口语交际。对内对外，口头和书面均可两便。

生命力之强大在闽台闽南话也是极为显著的。上文所述日本占据台湾五十年，闽南话不但未被磨灭，反倒更少变化，便是突出的事实。闽东、浙南的许多方言岛，有的只有数百人，闽南话也能存在数百年之久。现今的新加坡百分之八十的华裔中，闽南话势力最大。印尼与马来亚、菲律宾等地也有许多通行闽南方言的乡镇。可以说，从海峡两岸外出的闽南人，不论批量大小，时间长短，路程远近，总要顽强地保留自己的母语。这种力量来自对故土的依恋，对乡情的珍惜，以及对自己祖先所创造的文化的自豪；同时，也由于出外谋生的艰难奋斗之中，需要有乡亲们的相互提携和协同团结。共同的方言，不正是沟通感情、协同动作的最佳工具吗？

(三) 扩散型

正因为闽南方言是稳固的,随着闽南人的海上播迁,闽南方言也在中国沿海乃至整个东南亚海域扩散。单就国内而论,数百年间它就从闽南本土扩散为五个省的五大块,占据着全国海岸线约三分之一,外扩的地域和人口早已超过本土。除本土外的四大块的人口就在四千万以上,超过本土人口的两倍。东南亚各国至少还有两千万。像闽南话这样向外扩散的规模是其他汉语方言难以比拟的,客家话在国内外的流播和粤方言在国外的流播,地域可能不比闽南话小,但人口是一定不如闽南话多的。

向外流播是一种扩散,向后到者普及以及为相邻者接受,也是一种扩散的方式。在闽南本土是没有方言岛的,陆续到来的人在语言上都被同化了。像厦门、台北这样的大城市甚至大批外省人涌入之后,也多数接受了闽南话,尤其是他们的第二代,几乎没有例外。在台湾,虽然有客家方言岛,大多数客家人都兼通闽南话。闽南的方言边界——南靖、平和、诏安的西缘,通行的是客家方言,那里的人大多数也兼通闽南话。相对而言,边界上的闽南人兼通客家话的人数要少得多。在东南亚各国的华裔社会中,往往是闽南籍、客家籍和广东(粤语区)籍的人杂居,也是后者兼通闽南话的人比闽南人兼通客家话或粤语的人多。例如新加坡、闽南话实际上成了华人社会的共通语。

闽南方言的这种扩散力量显然是它的向心力、稳固性所决定的,同时也和它拥有丰富多样的语言艺术加工形式,和它的多功能性有关。

(四) 多能型

闽南方言,尤其是海峡两岸的闽南话,不但有丰富的口语表达手段,而且可以用文读音诵读古诗文,文白相间诵读白话文;不但有日常生活的俚俗语体,而且有文学加工的典雅艺术语体。这说明了闽南方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充分地发挥其交际作用,它的交际功能是全方位的。这种特点,可以称之为多能型。

在南方的和共同语相差较大的汉语方言中,粤方言也是典型的多能型方言。从人民的日常交际到儿童读书识字,乃至讲解科学知识、编故事、写小说,粤方言都可以应用自如,无须借助共同语。闽方言中的一些小区,甚至像福州话这样的古老方言,年青一代已经难以用方言诵读古今书面语了。

和粤方言相比,闽南方言的应用领域不如它那样广泛,方言书面语也缺乏完整的书写体系,不像粤方言那样,说得出的音都有写得来的字,但是,方言文学加工的形式之多样,粤方言则不如闽南话突出。

闽南方言的文艺形式,最早有以说为主的木偶戏和以唱为主的南音。南音又称南曲,是从唐代宫廷音乐继承下来的。唱词典雅,曲调悠扬。木偶戏又有提线式和布袋式(掌中班)两种,提线木偶多见于佛事活动,演的以目莲故事为主,又称“目莲傀儡”;布袋木偶多演历史故事,水浒、三国故事应有尽有。漳州兴起之后,又有漳腔的清唱形式——锦歌,是民间小调加工而成,内容多反映现代生活,曲调流畅活泼。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吸收南音的曲调成了梨园戏,明代中叶就十分兴盛。到了清代中叶又出现了兼重武打的高甲戏。辛亥革命后,台湾还创造了以锦歌清唱为基础的歌仔戏,传回大陆之

后又称芗剧；在潮州汕头平原还有潮剧，在海南岛有琼剧。像这样同一个方言区并存着如此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实是各方言区所未见的。

方言文艺的充分发展和闽南地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经过多种形式的文学加工，方言词汇更加丰富，句型更加多样，从而更富于表现力，方言代表点的语音和词汇也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因此，它又是造成闽南方言的向心性、稳固性的扩散力的重要因素。

（五）双语型

这里说的双语型，指的是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即在方言地区虽然广泛地通行本地方言，却不排斥民族共同语，而是共同语和方言双语并用，并在方言使用中大量吸收共同语的成分（主要是词汇和语法上的）。

在早期的南音唱词和梨园戏戏文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词句都和当时的书面共同语十分相近。方言口语向前发展，和宋元以来的白话形成越来越大的差异之后，人们对于学习共同语也越来越重视。1800年的《汇音妙悟》就收了不少“正音”（即按官话读的字音），印制《十五音》的漳州颜锦华木板同时刻印了蔡伯龙所著《官音汇解》一书，将方言词语与官话逐条对照。（此书后来被蒋致远收录《中国民俗丛书》）。到了晚清的切音字运动，两位早期的发起人——同安人卢懋章和漳州人蔡锡勇都十分重视指导人们学习普通话。在他们的著作（《一目了然初阶》和《传音快字》）中，都有“京腔”拼音方案。卢懋章在1892年所写的《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中说：“十九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略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辛亥革命后革除旧学，兴办新学，在闽南地区，自从三十年代普及新学之后，儿童读书识字都从学习注音字母、拼读普通话字音入手。台湾光复之后的国民教育也十分注重学习国语。因此，在闽台两地，通行闽南话的地区，略有文化的人都兼通国语，与本地人说闽南话，与外地人说普通话，已经成了一种传统习惯。

闽南方言和粤方言都是向心性、稳固性、扩散型、多能型的方言，唯独在双语型这一点上，二者有明显差异。粤方言区的普通话远不如闽南方言区普及。究其原因可能与地理位置及文化传统有关。福建毕竟不像地处岭南的广东那么边远，沿水路与江浙乃至长江流域的交往较为便利。自唐代以来，闽南士子求学从政就代有人出，从朝野文人到平民百姓都未曾忘却自己的祖先是从中原南迁的，宗谱之续，绵延不断。

三、闽台方言与闽台文化历史发展的特点

以上所述，说明了在闽南方言区的分布地域中，漳、泉、厦地区和台湾省的闽南方言在文化类型特征上是最为接近的。这两个板块同属一种方言口音，正是因为它们同属于一个文化圈。我们如果进一步对这个文化圈进行一番宏观的纵向考察，就不能看到这个文化圈所具有的历史发展的特征。它将给人们带来许多深刻的启示。

（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新环境下的创新——从中原文化到海洋文化。

闽南人世世代代都记住自己是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炎黄子孙，对于祖地寄托着无限依恋之情，出外华侨称家乡为“唐山”，称华裔为“唐人”。既说明华人出洋始于唐，也说明人们对盛唐是引以为荣的。对于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文化传统，人们也都能恪守不移。从一些常用方言词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闽南话里，做人尚“忠直”，“奸雄”“奸臣头”则为人所不齿，必须提防“大奸似忠”的话连目不识丁的老妇也能说；称厚道、老实为“古道”“古意”；待客讲究“礼数”，办事讲究“理路”，办法总要讲究分寸，称为“法度”；褒扬的是“能征惯战”的“豪杰兄弟”，鞭挞的是“不受教训”的“懦夫”、“乞食骨”（贱骨头）。无论在社会上或家庭内都必须“照君臣礼”，务农要“认路认份”，经商则信崇“有道得财”。凡是“古上书”（上了古书的）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许多成语谚语虽是用文读音说的都早已家喻户晓，童叟皆知（下详）。虽然闽地边远，初来时这里还是一片草莱，士大夫们一直以发扬中原文化为己任，以建设“海滨邹鲁”为努力目标。

然而移居闽南的先民毕竟到了一个崭新的环境。从华北平原的一派平川到丘陵起伏的沿海，从中州京畿到百越杂处，不论是地理条件或社会环境都有极大差异。在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时代，看来，他们从古越人那里学来的刀耕火种和近海捕捞还不足以养家糊口，发展事业。逐渐地“骨力食力”（勤劳为本）的人民，经过长期的摸索，终于懂得了在不多的平洋田里轮作套种，多种经营，种植水稻、旱稻、花生、黄豆、甘蔗、黄麻，在山地种茶、种果、炼铁、烧瓷，在沿海围垦、捕捞、种蛭、采蛎，进而造船航海，经营进出口贸易。到了宋代，泉州的造船业已经冠于全国，《太平寰宇记》将船舶列为闽南土产。《舆地纪胜》所收《泉州诗》云：“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有了大量船舶和熟练的水手，泉州港一跃成了东方大港。二十年前泉州后渚港发掘的宋代货船从规模到工艺都令人叹为观止。绍兴年间稳定建立的泉州市舶司成了南宋王朝的摇钱树。宋代泉州商人的足迹北到高丽，东到日本，南到印尼，西达阿拉伯。泉州港的贸易显然大大刺激了闽南地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安溪的茶，晋江、南安、永春、德化的瓷器早就有了大宗的出口。应该说，到了两宋时期，闽南地区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海洋文化；沿海带动内地，城市带动农村，造船航运、贸易、移民都是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走到外部世界之后，人们学会了同异邦异族的和平相处，眼界开阔了，观念改变了，才干也增长了。正是有了海洋文化的陶冶，到了明清两代，有李贽的反潮流，有洪承畴的识大局，有郑成功的伟大壮举。尤其是郑成功复台，不但能组织和训练每船装有二百精兵的四百艘战船队，而且能在严令沿海迁界对台进行禁运封锁的情况下，独操广得“通洋之利”，方能“以海外弹丸地，养兵十数万，甲冑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而财用不匮”。（郁永河：《裨海纪游·伪郑逸事》）

从今天海峡两岸的闽南方言谚语，还可以找到许多海洋文化凝炼出来的哲理。例如“穷无穷种、富无富栽”是对天命的质疑。“天无绝人之路”、“东洋无洋过西洋”，说的是向海洋进发。虽然“行船走马三分命”，但是“无拼无性命”“敢死提去食”，只要有

“横心做一倒”的拼搏精神。不过，出外冒险需有“同行不如同命”的互助友爱，“相分食有伸（剩），相争食无够”。到了外地又得“入风随俗，入港随弯”，“好歹钱相夹用”（交各种各样朋友），懂得“敬神不如敬人”。这类材料真是比比皆是。

海洋文化曾经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提供了宝贵的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今天，我们又处于一个崭新的对外开放的时代，研究闽南方言文化圈的海洋文化就更有现实意义了。

（二）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统一——乡土观念和民族精神的结合。

闽南——台湾的方言文化圈是一种地域文化。这种文化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乡土观念。这块宝地曾使他们的祖先避过了中原地区的战乱，得以生息，又得以发展，因而世世代代的闽南人对自己的乡土寄托着无穷的眷念。“乌篮血迹”（出生地、摇篮地）在闽南话里是十分神圣的字眼。出洋的侨胞潦倒病笃也要拖着残躯回乡，将骨头埋在故土。起家发达的富豪则恪守“番平钱，唐山福”的信条，把钱寄回老家，为家族修祖坟、建新居，为乡里修桥造路，兴办文教卫生事业。再破旧的“祖厝”人们也不愿意拆除，因为是“祖公业”。再贫穷的家乡也要回来探望，为的是“显祖荣宗”。初次出洋的“新客”，语言不通，“头路”（职业）难觅，往往可以“把草找亲”，在堂亲本家那里“浪邦”（寄食）数月经年亦属寻常。一去不复返，不认祖籍亲邻者，人们鄙称为“无良心”的“番猪”。移居台湾的闽南人也往往聚姓而居，聚籍而居，并用自己的故乡之名为新村命名。早年的台湾地图上“泉州里、南安村、安溪里、诏安村”之类地名随处可见。这类村落往往续修族谱，连“镜境”的“佛公”（菩萨）也供奉如故。今日台湾，林默娘（妈祖）的天妃宫，吴李（吴真人）的慈济宫，郭忠福（郭圣王）的凤山寺，这些由闽南地区的活人神化而供奉的寺庙，香火之盛比闽南地区有过之无不及。

这种浓郁的乡情又是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和平时期，狭隘的宗族观念可能使细小的利害争执酿成乡村之间、族姓之间的械斗；然而在民族大义之上又能精诚团结，一致对外。这样的时刻，必有贤者奋起号召，组织千百万志士作殊死的抗争。抗倭英雄俞大猷，“开辟荆榛逐荷夷”的郑成功，抵抗日寇的丘逢甲、刘永福等民族英雄，所以能一呼百应，四方慑服，就因为闽台人民素有这种威武不能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渡海、出洋的闽南人的民族主义还有一条难能可贵的原则，就是扶善抗恶，不怕硬而不欺软。数百年间，闽台人民受到倭寇、“红毛”、“花旗”这类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和残害是罄竹难书的，人民对他们的抗争，也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而对于所到的“番邦”（侨居国）的“番仔”，闽南人历来是友善地同他们和平相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生产，建设侨居地。移居东南亚的闽南人大多数兼通当地民族语言。据1972年统计，新加坡的华人兼通马来语的达45.8%（《新加坡的社会语言》），在新马、印尼一带，闽南话和马来语有不少“双向互借”的同义词。即同一概念，马来语有闽南话借词，闽南话也有马来语借词，有些语词竟已分不清谁借谁。例如闽南话的“食”，马来借读为ciak；马来语的makan，闽南人借读为“马干”；闽南话的“情理”，马来语

借读为 Cengli；马来语的 patut，闽南人借读为“巴突”；闽南话的“食力”，马来语借读为 cialat 或 celaka，意指遭殃，闽南话又将词义加重了的 celaka 借回（音“之蜡甲”）。这种少见的民族间的语言交流不正是闽南人和马来人和平相处的见证吗？在渡海开发台湾的先民中，有一个精通高山语的吴凤，他为了汉人与高山族同胞的友好相处，苦口婆心说服高山族人革除猎人头的恶俗，最后献出自己的生命，换来了社会的进步。吴凤的动人故事，一直在民间被颂扬着。

（三）土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的相互渗透——语言文学上的典雅与俚俗的共存并用。

在封建社会里，任何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都有土族文化和平民文化两种内容，二者之间有对立、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一面。闽南方言区明显地把这两种文化融为一体了。这充分地表现在方言和文学艺术上。

如上文所述，闽台地区的方言文艺既有典雅的南音清唱、梨园戏，又有民歌基础加工的歌仔戏、芗剧；既有韵文唱词的提线傀儡，又有口语叙述的掌中木偶。老一辈文人还有一套吟诵古诗的曲调，这是典雅的文言；辛亥革命之后又有韵白相间的“搭嘴鼓”，最早兴起于台湾，四十年代就有著名艺人蓝波里，近年来厦门地区也有所发展，这是通俗生动的方言口语。正是这样的雅俗共存，使闽台的地方文艺格外丰富多彩，这在其他方言地区也是少见的。

在语言方面，众所周知，闽南话的字音有文读音和白读音之别，文读音往往用于文言词、书面语词，白读音则用于日常生活的通俗语词。在常用的口语中，这两种读音又是相互穿插，混合使用的。下面仅以若干谚语为例（=为文读，一为白读，～为训读）；

文读音

家和万事成
一男一女一支花
 早出日，不成天，
人无千日好
天无绝人之路
有功无赏
十赔九不足
清官难断家务事
惯者为师
害人则害己
来者当受，去者不留
上不正则下歪
眼不见为净
人穷志不穷
先小人后君子
受死不受辱

白读音

多牛踏无粪
一下雷天下响
春寒雨那溅
近溪搭无渡
相分食有剩
有船无港路
十个掌头有长短
仙人拍鼓有时错
船过水无痕
百般起头难
脍用驶船嫌溪弯
做贼一更，守贼一暝
目睷脍贮得沙
穷路莫穷厝
肥水不流别人田
好头不值好尾

自然，在这个文化圈里，也有贫富之间的差异，也有酷吏与善民的树立，然而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可以想象，辗转近徙而来的闽南先民初到这里披荆斩棘，不论贵贱，困顿是共同的；后来的艰难创业，不论主仆，总需吃苦。这样的时间长了，两种文化的渗透自会更多。

（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沟通——城市方言与乡村方言的交融

中国早期的城市的兴起，看来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有所不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手工业、航运业和商业贸易，城市的繁荣对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刺激，虽然打破了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格局，却不像西方那样造成农村的严重破产。闽南兴起的城市都是些小城市，一开始就把商品生产辐射到农村（如制茶、烧瓷），内河和外海航运的船工、水手也都来自农村，城乡之间的交往是比较平和的。由于耕地本来就不足，城市资本向国外发展的更多，向农村兼并土地并不十分剧烈。土地改革时工商业地主数量不多，占地也不广。出洋谋生的华侨更多是乡下人。在许多侨乡，华侨发迹之后，多将资金用于家庭消费和兴建家业，在城市投资的较为少见。城乡的生活水平相去不远。城里人在文化上对乡下人的歧视也相对较小。农村的剧团、乐队只要艺术水平较高，在城市一样受到欢迎。带着乡下口音的乡下人在城里受欺凌的现象不像有些城市那样突出。反映在方言中，城市方言往往接受农村方言的成分。厦门兴起之后形成的厦门腔就是泉州腔和漳州腔的融合，拿语音的韵母系统说，至今还可以在厦门音里找出泉州腔和漳州腔的不同来历：

泉州腔

u 湏 = 输（漳：i）
 a 家 = 胶（漳：家 ε）
 ue 瓜 = 鸡（漳：瓜 ua，鸡 e）
 ioŋ 良 = 龙（漳：良 iaŋ）
 ŋ 酸 = 霜（漳：酸 u i）

漳州腔

u 资 = 朱（泉：资 w）
 o 高 = 哥（泉：高 ɔ）
 ɔ 茂 = 暮（泉：茂 io）
 iam 针 = 尖（泉：针 am）
 iap 汁 = 接（泉 ap）

如果说语音还有较强的系统性的话，在词汇方面乡村方言汇集于城市方言的现象就更加突出了。由于闽南的城市历来不大，与乡间距离不远，城市联系十分紧密，因此，许多乡间语词也传入城内，形成大量的同义词。以泉州话的几个常用单音动词为例：

表示“给予”的动词，早期泉州话多说“乞”[k'itɿ]，见于明末的《荔枝记》这种说法最普遍；后来泉州话多转用为介词（“乞人捌去”）。现代泉州话较多说度[t'ɔɿ]或传[tɿɿ]，而流行于晋江的涂[t'ɔɿ]，流行于惠安的糊[k'ɔɿ]、裤[k'ɔɿ]，也已传入泉州，城内人也认可了。

表示相“遇”的动词，泉州原说撞着[tɿɿ]，tio.ɿ]，南安说拄着[tu tio.ɿ]，晋江、惠安说遇着[buɿ]，tio.ɿ]，今泉州城内亦三种说法皆通。

表示“放置”的动词，泉州多说下咧[k'eɿ le.ɿ]，厦门音[heɿ le.ɿ]，南安、晋江说在咧[saiɿ le.ɿ]，惠安说跨咧[k'uaɿ le.ɿ]，各种说法在现今泉州城内亦均可接受。

◆ 中华文化与地域文化研究

表示“在”的动词，泉州说在咧〔tw-l le.l〕，惠安说着咧〔tioʔ-l le.l〕，城内今亦可通。

表示“住着”的动词，南安说按咧〔an ɿ le.l〕、那咧〔na ɿ le.l〕，泉州说带咧〔tua ɿ le.l〕，同安说站咧〔tiam ɿ le.l〕，今泉州话也均可通行。

以上是对于闽台的闽南方言文化圈在已有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点的粗略概括。方言是不断变化的，文化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近数年来，闽台的隔绝局面终结了，大量台胞返回大陆探亲访友、寻根谒祖，不少台胞来闽南经商办厂，畅通无阻的闽南方言正为海峡两岸的同胞续写文化史的新篇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昨天是为了把握今天，安排明天。从这个文化圈的历史特点中，我们是可以获得许多宝贵的启示的。让我们为这条文化演进的长河推波助澜吧！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